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六九期 ——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9 a）

【往事追忆】回忆“八一八”	运 城
忆北大文革旧事	理 胜
红鲁艺	胡发云
给毛主席献花女孩的文革厄运	吕大渝
“牛长”	方 成
一份揪心的表决心书	金雨雨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往事追忆】

回忆“八一八”
• 运 城 •

周末到朋友家去参加他们为子女去上大学而开的送行聚会。朋友十五岁的女儿就要离开家去斯坦福大学了。当她在聚会上致词感谢父母的养育和支持，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的时候，我不经意的看了一下手表，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八月十八日。时钟一下把自己带回到三十五年前“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中。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会记得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几十万“红卫兵”（号称百万），从而正式把那场历时

十年的浩劫从学校门内引向全社会。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自己那年也是十五岁，还是靠跳了一班才正好读完初中，即所谓“老三届”中的“六六初中毕业”。那年的八月初，在大学做教授的父母被大学及附中的“红卫兵”们当做“牛鬼蛇神”抓去游了街，家也被抄了。不过当时在天津的中学中，针对“黑五类”学生的歧视和迫害行为还没有全面展开，所以我们这些家中有“问题”的学生们，还是非常自由的。我一方面对家长受到的“冲击”不太理解，另一方面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发生的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感到非常的震惊。为了弄清个究竟，我和同班的几位要好的同学决定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祥地北京看看。天津北京相距120公里，大家一商量决定骑自行车去。要在平时家长们是不会同意的，但此时他们大多都成了“牛鬼蛇神”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批准了。八月中旬的京津，白天有时气温可达40度，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晚上出发，大家先各自回家准备些钱和粮票。当天晚上的“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听到这些消息大家更觉得我们进京的计划是对的。

第二天（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应该是八月十日至十二日之间）傍晚，我们六七十个同学就蹬着自行车上路了。刚上京津公路不久，就下起了暴雨，大家在暴雨中拼命地猛蹬，一个多小时后雨停了，我们也骑出了六十多里路，到了杨村。大家想在路边休息一下，可大批的蚊子蜂拥而至，只好重新上路。因为我每年暑假都来北京路熟，过了通县后由我带路。大约凌晨四五点时，我们进了建国门，串过了东长安街，终于到了天安门前。大家实在太累了，就倒在中山公园的红墙外睡着了。睡了大约半个小时，被公园上早班的工作人员唤醒，说是一会儿上班的高峰就要到了，在这里睡觉影响不好（当时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还在正常运转）。于是我们继续向西，几分钟后就到了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大家怀着敬仰和好奇的心情想往里看，无奈那巨大的影背墙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许多年后当我第一次去华盛顿时，见到路人能够透过铁栏清楚地看到白宫里人员的户外活动时，还回想起第一次骑车路过新华门时的情景，不由得为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深有感叹。我们又顺着府右街再次从中南海的侧门前骑过，虽然没有看到什么中央首长，但毕竟是围着中南海绕了半圈了，大家心里也感到挺满足了。在西四的一家早点铺香香地吃了一顿后，我们继续向大学区进发。本来是要去北大的，但到了人大门口时，由于实在太累了，就进去了。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教室中住下，大家把书包和湿衣服往由课桌搭成的大通铺上一丢，就急不可待地跑去看大字报。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孩子们，大字报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了。但不同的是当时天津院校的大字报除了一小部份是针对校党委中在运动初期被抛出的“走资派”外，主要都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而在北京的大字报有些却好像是指向更高层的，看起来颇有新鲜感。

十五日晚人大负责接待外地学生的人员通知我们第二天有中央首长接见，要在早六点集合。十六日早上我们被汽车拉到工人体育场，那里共有大约十万名北京和外地的学生。上午九点多（也许十点多，记不太清了）中央首长们开始出现在主席台上，我们当时所在的看台离主席台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人的面孔，有林彪，周恩来，刘少奇，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首先由林彪讲话，他刚刚用他那独有的软绵绵的长腔“同志们，同学们”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央首长第一次公开接见学生们，许多人出于宗教式的崇拜心理，非常渴望能亲眼目睹一下首长的尊容，还有许多人几辈子都没有见过什

么大官，一定不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开眼机会，于是有几十人上了主席台的屋顶，然后爬在屋檐边往下看。这时周恩来走到主席台的边上，抬起头和屋顶上的学生们讲，这样做太危险请他们马上下去。但学生们不听劝说，不肯离去。此时又有更多的学生陆续爬上了屋顶。周恩来和他身边的人们商量之后只好宣布由于会场秩序混乱，为了保障同学们的安全，决定取消这次接见活动。这是中共建国后有如此众多最高层领导人参加的公开活动中，唯一被迫中途取消的一次。此事从未见报，在众多文革史料中也未被提及，自己有幸成为经历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十六日下午回到人大后，我们决定搬到北大去，骑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然后又马上在北大校园内看大字报。十七日晚上学校又通知说第二天有中央领导接见，晚十点集合。我们又被大公共汽车拉到西单附近下车，然后又编队向天安门进发。我们这批人被带到金水桥的正前方偏东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那里距金水桥只有三五十米，向天安门城楼望去，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大约在凌晨三四点钟，我们的队伍又被带往东南方向几百米外的地方，比起大多数人来还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了。我们班一位姓李的同学那时正好去上厕所，所以和我们走差了，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后来听他讲，十八日凌晨五点多，毛泽东到了金水桥边的红卫兵中间，他隔着三五十米，看得很清楚，但挤不过去。回来也有此传说，但是非我亲眼所见，不知是否确切。又是十点钟左右，中央领导人们陆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在解放后第一次穿上了绿色军装，广场上的学生们分辨不出他来，反到是一头白发的刘少奇被学生们一眼认出了。于是广场上的许多学生一起高呼“刘主席，我们想见毛主席！”可他们哪里知道就在十天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已经受到了批判，而毛正在发动的这场文革即将致他于死地。大会正式开始后，又是林彪讲话。这位被外界不为熟悉的国防部长再次在文革中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面使我们都有些惊讶，因为我们还不知他已经被订为副统帅了。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第一次戴上了北京红卫兵献上的“红袖章”，成为了红卫兵们的红司令，而震惊历史的“红卫兵运动”也从此迅速地席卷全国。

掌声使我又回到了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望着朋友十五岁女儿那充满稚气的脸，我不禁在想，她们这一代人是多么的幸运呀！三十五年前我也是十五岁，我曾亲身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而那个事件就好像是中国十年内乱的“开幕式”。自己也历尽了“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磨难，好不容易在这块新大陆上站稳脚跟，可也到了“知天命之年”了。

∞ ∞ ∞ ∞ ∞ ∞ ∞ ∞ ∞ ∞ ∞

忆北大文革旧事

• 理 胜 •

写完这个题目后，我必须马上声明，我不是北大同人，与北大没有任何工作或个人关系。北京大学刚刚庆祝过百年校庆，如日中天，光彩辉煌，我不是不想沾这个光，而是实在没这个缘份，我没在北大读过一天书，听过一堂课。唯一在北大受过教育的机会是在1967年五月底，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时，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看过用金纸复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现在很多以北大同人而自豪的专家学者，当时也曾为这张大字报实实在在地骄傲过好几年。当然

，这张大字报也曾制造了大批冤案，把一大批北大师生迫害得家破人亡。文革前的北大，可以说是学派林立，名家荟萃。文革开始后，竟被称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多少名闻中外的学者教授不是被“抓王八”的北大学生毒打至死，就是宁死不受辱，以死抗争。也许我久居海外，孤陋寡闻，除了季羨林老先生一篇“北大的监狱”外，我没看见过一篇关于文革期间北大的文章。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号称有五千之众，北大的酷刑逼供，至死人命的冤假错案，十有八九出自他们之手，这些“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我要写的，是1968年我被抓进北大的见闻。读者也许会奇怪，北大不是专政部门，我“一不是响马与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于北大无怨无仇，怎么会被抓进北大？这还要从北大的文革历史谈起。1966年6月1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正式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作者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尽人皆知的文革英雄。压对了宝的聂老太欣喜若狂，企图趁热打铁，借北大这块中外闻名的金字招牌为自己树碑立传，名扬千古。这位“通天人物”趁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请毛为北大提词。毛泽东不忘聂元梓立的文革头功，亲笔手书“新北大”。领到了“圣谕”后，聂老太骄横有加，一心想在北大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在铲平山头林立的群众组织后，成立了“新北大公社”，自任一把手，夺了北大党委和校长的权，一统北大天下，人称北大的“老佛爷”，“太上皇”。这位“老佛爷”一心想做慈禧太后第二，在北大一手遮天，专制独裁，引起不少师生的不满，以致反对势力日益壮大，最终成立了对立派“井冈山兵团”。

聂元梓当然不能容忍向她在北大绝对权威的挑战的行为，动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威胁对方。要不就搬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压人。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经过观察和思考，认清了聂元梓的野心和水平，这种威胁和恐吓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但是反对派师生绝对没想到，一个欲置他们于死地的罪恶阴谋正在策划之中。据当时“新北大公社”散发的宣传材料声称，“新北大公社”成员大都是“根正苗红，三辈贫农”出身的“天生无产阶级左派”，而“井冈山兵团”多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知识份子家庭，革命阶级就是要用武力镇压反革命余孽。实际情况是，很多有正义感的工农子弟由于不满聂元梓的倒行逆施而加入“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中的保聂派多是那些昧着良心卖身投靠以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小人。三十多年之后，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井冈山派的北大校友仍拒绝与当年“新北大公社”成员合影留念。

1968年3月28号后半夜，拿到“老佛爷”手谕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睡梦中的井冈山一派的师生发起突然袭击，甚至连女宿舍楼都未能幸免。很多人仅穿着内衣裤逃出宿舍，个人多年的积蓄丧失殆尽。“新北大公社”战士每占领一座楼，立刻将书籍财物瓜分一空。“井冈山兵团”师生被迫奋起还击，保住了28、36等6座宿舍楼，打退了武斗队的轮番进攻，使聂元梓把“井冈山兵团”赶出校园的阴谋未能得逞。在这之前，北京高校两派还只是在观点立场上互相攻击，顶多是辩论激烈时相互推打几下，从未出现过动用刀枪的大规模武斗。北大3·28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从此以后，各大学武斗迅速升级，清华、北外、京工、人大等校都出现了以武力把对立派赶出校区的现象，同窗之谊竟成为兵戎相见的生死仇敌。武斗中杀死对方学生的事件已不再是新闻了。武斗杀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

井岗山一派占据的六座楼只有37斋（文革后改称楼）紧靠马路，校园围墙已被3·28晚上夺路而逃的学生推倒，是唯一进出校园的通道。然而，各楼之间的通行被新北大武斗队封锁，他们用整条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袭击行人，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井岗山派把学生宿舍的双层床排列起来，形成一条封闭走廊，方保证了楼间的行人安全。“老佛爷”聂元梓一心要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快，一计不成，又企图以停水断电将“井岗山兵团”逼出北大。3·28以后，绝大多数井岗山一派的师生因无家可归而离开北大，只有那些决心与聂元梓拼个鱼死网破的中坚份子留了下来。他们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为了生存，他们试图从马路边高压电网接电入37楼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色儿的矿工头盔，铁网面罩，薄钢板盔甲，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列队出战时，威风不减当年古罗马武士。反观井岗山队伍，头带白柳条帽，甚至棉帽子外面套个硬纸盒，手持七长八短的水管做的扎枪，盔甲则是用布缝在一起的几层洋铁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如当年丐帮聚会，连他们自己看了都觉好笑。然而，就这么几百人，被数千人封锁围困，停水断电，绝粮断炊，居然寸土未失，坚守达四个月之久，直到七月底8341军宣队进校。中国兵法中哀兵必胜的用兵之道，在北大武斗中再次得到验证。至于军宣队秉承上谕支持聂老太，继续迫害井岗山派则是后话。一位我认识的学生，长得象电影《停战以后》里香河县长班长芦，外号老班。坚守37楼四个月始终乐观自信，但后来竟被军宣队逼疯，跳楼而死。还有一个学生被迫害得无路可走而自杀。他躺在上层床上，把电灯里的两根电线绑在两只手腕上去拉电灯开关。没想到电流通过他的身体时，肌肉突然收缩，身体从床上摔了下来，拉断电线，才免于一死。

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2路公共汽车经过北大南大门和37斋，当时的32路是一辆SKODA大客车带一辆拖车。“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迫32路车停驶，摘下拖车推着前进，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在拖车的掩护下向37斋逼近。可能是因为用力不均，拖车突然就地转圈，藏在车后的武斗队一下暴露在对方的大弹弓射程内。被一阵弹雨打得东躲西藏。此时，守楼学生把黄豆撒在马路上，武斗队一个个滑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丐帮”们乘胜出击，喊声震天，勇不可档，一鼓作气把“老佛爷”装备精良的“御林军”赶了回去。两个物理系学生趁机把路边一万一千伏高压线与楼内早已准备好的变压器及配电设备联接起来，恢复了供电。这以后，“新北大公社”多次组织武力强攻井岗山派驻守的地盘，均无功而还。最后，他们采取了封锁37楼出口的策略。企图以断绝粮食给养，困死饿死对立派楼里的师生。他们日夜监视37楼出口，不许一人进出，抓捕所有出楼人员。我就是这时被抓进北大的。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原来住30楼，3·28夜晚，在睡梦中被同寝室新北大派用扎枪赶了出去，连外衣都没来的及穿。这以后他只好住到37楼。为了不被赶出校园，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权而加入保卫37楼的行列。因为我所在的大学两派也在武斗，我在校无事可做，就到处收拣别人丢弃的武斗用品，如漆柳条帽的油漆，做面罩的铁网，破自行车内胎送到36楼装备“丐帮”。有一天，我一大早就把收集到的物品送到北大，然后就和熟人聊天儿。没多久，“新北大广播台”的高音喇叭就宣读了“封锁37楼狗洞通令”，理由是要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

文革时期，无论是定罪名，还是两派互相攻击，上纲上线的夸张程度，比起李白诗中的“白发三千丈”也毫不逊色。在垃圾堆上烧两封信能说成“企图烧毁大楼”，打架流了鼻血叫“血洗”，改锥是“凶器”。樊能廷是南京人，化学系63级学生，天生的乐天派，一开口则笑语连珠，令人捧腹。3·28武斗开始后，他被从30楼里赶出来，也住在37楼。一日聂元梓以校领导身份到37楼训话，樊能廷正在维修通电路，听说老佛爷驾到，拿着改锥就跑去看热闹。当时聂元梓被人团团围住，樊能廷也凑上去起哄。一边嚷嚷，一边无意地挥舞手中的改锥。看到明晃晃的改锥，聂老太的保镖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立刻绷紧了，认定是阶级敌人要行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立刻发出通令，“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当时樊就住在37楼，仍然与平时一样，乐呵呵地说笑话。但我知道，他心里未必像他表面那么平静。有一个叫刘伟的北大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身强力壮，是个运动员。一次在校外马路上被新北大派捉去，严刑拷打，竟被用钢鞭铁棒活活打死。他的同学为他办了一个遗物展览。我看的时候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樊能廷当然知道，如果他一旦落到这帮杀人狂手里，是很难活着出来的。“新北大公社”中“红五类”的心黑手狠，早在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时就已名扬北京高校。他们批斗时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甚至‘制造冤魂’。那些老教授临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几个月前还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的莘莘学子，用钢鞭木棒把他们往死里打时竟毫不手软。虽然我与樊能廷仅有一面之交，但出于对他命运的担忧，三十多年来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和他当“刺客”的经历。

37楼位于北大南校门和海淀校门之间，马路对面是居民的院墙，无法穿行。行人必须经过这两个校门前才能离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37楼出口，向海淀方向走去。当我走近32路车海淀站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好进站。两个彪形大汉以为我要上车，从路旁一下冲到车门口。然而，我却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他俩看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就不再假装过路人，公开尾随而来。走到海淀校门对面的时候，二人突然扑向我，一人抓我一条胳膊，把我倒剪双臂一手卡着我的脖子，好像“走资派”挨斗时坐飞机的姿势，押进全国第一流学府北大校园。过马路时，一个胖大和尚般的武斗队员（我敢肯定他是学生食堂的大师傅），哆嗦着一身肥肉跑来接应，以防有人来把我抢走。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井岗山的人早知道我会被抓，但我是外校人，不会把我怎么样。此时他们都在窗前观察我如何被抓，以便总结出反封锁的策略和办法，哪里会跑来救我。

我被押进海淀校门后，来到40楼前的一片空地，两名“捕头”把我交给一个戴头盔面罩，手持长枪的武士。此人两腿叉开，面孔上扬，极力想摆出一付威风神气的派头好给我个下马威。可惜的是他手中的长矛说明他只是个打前阵的马前卒。我告诉他我是外校来找人的，他厉声问我是否知道封锁36楼的通令，我说进了楼才听见，我还要回去吃午饭，他看我不象什么重要人物，就把我交给一个职工模样的中年妇女去审讯。她要我详细说明去36楼找谁，看见什么人。她还打电话到我所在大学核实我的身份。确认我不是井岗山派的人后，才让我走，但警告我不得再来。我环视周围，大约有几百人在待命行动。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武斗是早有计划准备的行动。院里人虽多，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工作周到细致。虽然各路人马进进出出，但并不混乱。北大素以文科见长，没想到还培养出精通兵法的将帅之才，只可惜用的不是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从37楼出来，骑车朝中关村方向驶去。路过34楼时，有人向我扔砖头。我气不过，调转头返回34楼下的小门和他们论理。他们没想到我会如此大胆，一下竟没有反应过来。当看清我只有一个人时，这四五个人一齐扑了过来，拳打脚踢。有一个人还脱下农村那种手工纳底的老山杠子鞋，披头盖脸地打来。我一面用自行车招架抵挡，一面高喊，你们不问问什么人就动手，还讲不讲理，叫你们的头头来说话。其中一人听我话中有话，叫他们停手，询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来找同学的，并反问他，你在校外有没有同学同乡，如果你去外校找人，被人不问青红皂白打一顿，你什么感觉。他有些不好意思，说现在正在武斗，一个个都火气挺大的。别人挨了砖头跑还来不及呢，你到返回来了。天又黑，我们还以为你是井冈山派来偷袭捣乱的。看来，只要气候环境变化，最高学府里平时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也会变成蛮不讲理的打砸抢暴徒，而且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行为辩护。

3·28以后，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去吃饭，没想到新北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有两个学生看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武士们追上用扎枪刺穿股动脉，尽管他们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大学同窗，竟然操戈相见并下毒手杀人，北大是“始做俑者”。从此以后，井冈山派被剥夺了去食堂吃饭的权力，他们只好在楼内架起炉灶，用打烂的桌椅床架烧火，煮些干切面充饥。自从37楼出口被封锁后，粮食运不进来，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的将就。那天被抓之前，我看见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姑娘提着一个大旅行袋走进37楼，打开后里面是满满一袋切面。原来是一个学生的妹妹专程从广州赶来帮助姐姐渡难关。

8341部队进驻北大“支左”后，总算解了井冈山派的围。学生在37楼出口搭了一座牌楼，两边的对联是毛泽东手书的两句话：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武斗期间曾在校内住过的井冈山派学生纷纷在门楼前摄影留念。我也凑热闹拍了一张手持语录的照片，而且保留至今。现在看起来，那付神气样实在是愚的可笑，但当时确实是很认真的。前两年回国探亲，去颐和园回来路上经过北大，我特意在海淀下车，走到中关村。从海淀校门到南校门中间的宫廷园林般的石砌围墙都已变成商店铺面，当年的“狗洞”早已踪迹全无了。唯有37楼三楼一个窗下还依稀可见用砖修补过的痕迹，那是为了接变压器拆的缺口。除了武斗时在37楼住过的几十个学生，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这面窗下有修补过的痕迹。回想当年在这里的经历，我面对37楼伫立良久。不过三十多年，北大红卫兵的残忍，老教授的惨死，武斗的疯狂早已被岁月冲洗得干干净净。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师生，有谁知道这里曾发生过的武斗和北大的文革冤魂呢。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又有谁想得到当年进出这个校门的竟是顶盔带甲，手持长枪的武斗队。再过三十年，这些匆匆忙忙进出的年轻人也会成为历史，被后人忘却的，他们今天会想到这一点吗。

1989年有篇文章说，北京大学的威望是“五，四”运动建立起来的，象有某种遗传基因似的，七十年来，北大始终走在学生运动的前面。还有一位北大名人断言，如果中国所有的女人都是娼妓，所有的男人都是嫖客，剩下的一对罗米欧与朱莉叶十有八九在北大。前一篇文章说，在社会进步的潮流中，北大始终走在前面。后一篇文章暗示，当社会堕落时，北大永远落在后面。这么一说，北大简直成了

一方圣土了。成了宁国府门前那两个石狮子。其实鲁迅先生对此早有评价。他说：“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内的一部份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丑恶，最黑暗的时代。（当然，对某些人来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场运动中，北大不仅没落后，反而处处走在前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动北京高校第一次开杀戒的武斗，第一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以及“两个校，一张报，几个小丑嗷嗷叫”的样板经验（引自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诗抄）。我知道，文革是北大一块难以启齿的疮疤，是北大历史上违莫如深的禁区，一直为北大同人所回避。不少当年新北大公社的武斗干将，因保“老佛爷”有功而留校工作，他们当然不愿揭自己的疮疤。然而，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后人有权知道北大文革史实。我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引玉之砖，希望知内情的北大同人写出更多文革回忆录，留给后人。

我写这篇文章，并非与北大有怨有仇，也不是嫉妒北大的名声和北大同人的运气。我只是希望北大在文革中的这一段历史不要被遗忘。

∞ ∞ ∞ ∞ ∞ ∞ ∞ ∞ ∞ ∞

红鲁艺
• 胡发云 •

“红鲁艺”是文革初期一支中学生文艺宣传队的名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我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大串联之后，乘一艘美国登陆艇从上海返回武汉。那艘登陆艇的舰首宽宽的，象一个上大下小的梯形。前后甲板都很大，上面搭满了芦席棚，里面挤满各地的红卫兵和大中学生。舰的底舱也很大，也挤满了各地的红卫兵和大中学生。我想，当初造它的美国人绝不会想象到，它日后会派上这种用场。我不知道这艘美国登陆艇怎么会留在了中国大陆，大约是它的航速太慢，来不及开走。它每小时只行驶六、七海里。于是这一段航程，成为我本来就很孤独很寂寞的串联旅行中最孤独最寂寞的一段。

到那时为止，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半年。尽管一开始我也兴奋过，激动过，如同回到五四、抗战、一二·九那样的情景中，就像我读过的《青春之歌》那些小说一样，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么一场富于刺激性、挑战性的革命、从少年时就盼望了那么多年的革命，不是属于我的革命。这种感觉是从学校成立官办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组织，从班上那些出身工农、革干、军干家庭的同学喊出“自来红万岁”的口号时就开始了。它不光不属于我，甚至会威胁和压迫我，因为我不是“自来红”。我父亲是一名医生，解放前还曾做过国民党部队医院的军医。尽管他唯一亲历的战争，是与日本人打的那场著名的金牛之役，以后便一直在后方医院，但他毕竟是穿国民党军装而不是八路军军装的医生。况且，当时连武大校长、一大代表李达，省委宣传部部长曾淳这样的知识份子都成了黑帮内奸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那个火红的夏天，我成为逃避者，旁观者，或尴尬的参加者——比如开会、游行、集体到武大去参观批判武大“三家村”的大字报。我最怕集体喊口号、唱歌或在游行队伍中扭秧歌……那会使我觉得我在做不是我真情真心愿意做的事，尽管那时我和我的家庭尚未受到什么冲击——我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是我同桌的一个女生写的，她说我和她同桌一学期却从来不跟她说话，是瞧不起工农出身的同学的表现——但我看见了在许多班级的忆苦思甜会上，那些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同学，被人骂作狗崽子、吸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小吸血鬼、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许多这样出身的同学也流着泪痛骂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看到了那些级别较高的老师被剪了阴阳头，系着领带挂了高跟鞋顶了痰盂在烈日下跪在操场上。看到了我们学校那个叫陈邦鉴的数学老师在蚊帐中用剪刀剪断了自己的喉管，从半夜一直挣扎到天亮才死去。看到了那个叫许简的政治老师，因为将自己写的一些格言警句印成一本“三言两语”，而成为我们学校头号大批判靶子。看到学校教学楼上那条“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

那时我已写了好几年的诗，并将它们抄录在一个红色缎面日记本上。上高中以后，我曾拿给那个很喜欢我的作文的语文老师看过，他还用红笔改正了上面的一些错别字。那些诗，大多是一些少年的情愫，如《春晨》，《夕阳的海边》，《小流星》，《小溪流》（许多年以后，这些少年之作作为我创作的一段历史记录，陆续发表了一些）。也有内容比较革命的，如《黑孩子约翰》，《敬礼，非洲兄弟》，《毕业歌》，《在退队仪式上》及写给董必武老人的诗。（董必武曾在我上初中的那所中学工作过。我读初中时，他曾为我那所中学题过词。）但还有一些诗，在当时看来是消沉、孤寂、小资调甚至是修正主义的。如有一首《想往》，便叙说了对一个星球的想往，那上面没有阶级、战争、饥饿和瘟疫，没有国界来阻隔人们，大家信仰的是同一个主义（这首诗后来也收入我的诗集《心灵的风》）。这些诗，甚至包括前面那些诗，拿来批判，是极容易的。我想了很久，终于只撕去了其中两首，然后将那红色的缎面日记本在家中找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后来，我一直庆幸自己的那一念之举，使我少年时代的一些情绪与心境得以保存下来。

八月，运动渐渐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红卫兵们常常外出抄家或参加什么活动，我便可以不去学校了。我几乎天天独自一人到长江去游泳，到几所大学去看大字报，听辩论。不久，大串联开始了。这时的大串联还是由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红卫兵指挥部及班级文化革命小组指派的，基本上属于“红五类”的特权。我第一次面对了与我的同龄人在一个我很看重的具体待遇上的差异。但我不能不接受它。那段时间，我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渴望成为这场革命的参与者——这种渴望与其说基于对革命的向往，不如说对某种行为本身的向往。另一方面，又保持着排斥、抵触的孤傲情绪。学校曾发生过几次关于那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激烈辩论。这些辩论实际上主要是在“红五类”之间进行的，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即便有，也只会将结论复杂化。）有几次，我都想上台去，将我想过许多遍的话说出来。我想说说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还有鲁迅、周恩来，说说他们的家庭和经历，来反证这副对联。但我终于没有上去。我知道，那是一个靠气势，靠情绪而不是靠道理说话的时刻。

到了十月，大串联已变成了所有学生的个人行为，报上已开始用“伟大领袖毛

主席检阅革命师生”，而不再仅仅用“……检阅红卫兵小将”的字样。学校工作组撤走了；南下的学生开始围攻省委；从北京方面传来了一些重要说法，是关于党内的问题，关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前一段学校被揪斗的老师和被批判的同学，也不再成为运动的唯一焦点。在这种于我来说已变得稍微宽松一点的气氛中，十月下旬，我与另一个男生挤在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列车中去了北京。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在北大、清华、中宣部、中央音乐学院，我一方面为那宏大的场面，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作神一样的毛泽东主席，为那些惊心动魄的大字报大标语所感染所激动，一方面，仍为一种置身局外的寂寞所缠绕。就是在人海汹涌的天安门广场上，我也依然有一种深深的疏离感。在北京，在上海，我基本上独自行动，因为我希望去了解一下文学界音乐界电影界的情况，了解一下我从小景仰的那些大作家、音乐家、电影演员的境况。我看见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了牛鬼蛇神。那次去中宣部文化部，正碰见批斗贺敬之等一批作家、诗人。那时，我几乎读过贺敬之公开发表的所有诗篇。他的许多诗，包括象《雷锋之歌》那样的长诗，我都能整篇整段地背诵出来。而他也成了三反分子。这使我隐隐感到，这场运动已不完全像我前几个月理解的那样了。北京的一些高校，已出现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国首脑人物的大字报。但同一时刻，他们又出现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行列中。一些运动初期因反对工作组，反对官办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反对单位领导而被打成小爬虫、反革命的师生及其他人，已被平反、解放或对他们出现争议而不再是一边倒了。这一切，与前几个月斗老师，斗同学，斗地主资本家比，已迥然不同，充满一种神秘紧张的气氛。

那段时间及其后几个月中，对我最大的震动与改变，就是对许多人的神圣感与崇高感轰毁了，原来他们也贪财，也玩女人，也干一些不光明正大的事；也叛变过，也怯懦过，也斤斤计较过级别待遇甚至为此哭泣过……在心里深处，我觉得这些是比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不可原谅的。

尽管如此，直到我从那艘登陆艇上下来，踏上我的城市之前，我依然是一个旁观者。我希望参与，希望在这一场神圣浩大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寻求青春的价值青春的证明。那是我十七岁以来全部的教育所教给我的。我想，对于当时绝大多数都经受过这种极端统一的教育的少年少女来说，不论其当时的境况如何，这种内心的冲动是相同的。

回到学校，发现一切都大变了。学校很冷清，一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幅标语贴在最醒目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在用各种各样的观点讲着各种各样的事。再没有由校文革委与红卫兵指挥部组织的统一行动，又成立了另一些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显然区别于以前那种红卫兵，加上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红旗”、“井冈山”等各种前缀词汇。而且各个红卫兵组织还有自己独特的名称，如：“红旗公社”，“生死决战兵团”，“千钧棒”，“斯巴达克斯兵团”……大的有数百人，并与校外同类组织形成序列。小的几人，十几人。还有一个“一人战斗队”。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有的是从老红卫兵（当时老红卫兵因为不加前缀并与大多数其他红卫兵组织对立，已被贬称为“三字兵”，这种改变是富于挑战性与刺激性的，它不但蔑视了几个月前那种“自来红”的神圣与权威，甚至使人联想到毛泽东主席，因为他那张著名的穿军装的照片上，就是佩戴着这种只有三个字的袖章）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其中的工农子弟。或原

来是军干、革干，后来突然变成了叛徒、特务、内奸、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家庭的子女。一部份是运动初期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或小工商业者的子弟。还有一些出身高级知识份子家庭、一向胆小文静的女生，甚至有一批是运动初期的“狗崽子”们，父母自杀、被关被斗、被报纸点名的“从里到外”都黑透了的“黑五类”。他们有的还成为一些组织中很活跃，很有实力的骨干。大多数组织都有自己的油印工具、广播器材、对外联络站及袖标、旗帜、印鉴、活动经费及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几条标准观点——二十年后，当我见到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及更多比他们年轻的人，以同样的热情，同样的风格组建各种公司的时候，感到又亲切又熟悉又无可言说。

那时，学校党组织已瘫痪，省委市委也处于招架、维持之中。并且，“资产阶级”这个字眼，这个多少年来只因生活经历、社会职业、经济状态甚至思想而用于特定的一部份社会成员的字眼，已经用在他们头上，而且是主要地用在他们头上了。最先这样用的，是我们全国人民都很崇敬的毛主席。这使这个本来就严厉又含混的字眼，又有了更多的解释。我想，这对于长期置于它阴影之下的一部份人，无疑是一种宽释与转移。

我去过学校几次以后，决定不留在学校搞运动。一个原因是，半年以来，我已和学校的运动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一切于我来说已变得陌生。另一个原因，是我在回武汉的那艘登陆艇上看了一场演出。节目非常简单，就是一些歌唱毛主席的歌曲。乐队只有一把二胡，一支竹笛，一把小提琴。但那音乐，那少男少女的嗓音，还有他们之间在演奏与歌唱时的那种和谐，不知怎么特别地打动了我。或许是几个月来看过太多的狂热、凌厉、粗暴与恐怖，此时这些音乐变得格外温馨美丽。我一直喜欢音乐，也做过音乐梦。学过二胡，小提琴，钢琴，还作过曲，参加过学校的文工团。我觉得我能找到一种更适合我的革命方式与生活方式，那就是组建一个自己的文艺宣传队——那个时期，于我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时期。

我找到我读初中时校文工团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何帆（现在湖北省作家协会工作）。他当时在华工附中读高二。如我一样，他也一直游离于学校的运动之外。他父亲是一个化工技术人员，解放前曾与朋友合开过一家药店，因而成份定为工商业。他母亲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一个农场劳动去了。他是一个很聪明，也很有文学、音乐天赋的少年。他的大哥是武汉歌舞剧院的民乐演奏员，曾去过日本、香港演出。听了我的想法，他也很赞同。于是，我们拟定一个招生方案，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招收宣传队员。我们将招生中的政治条件定得比较宽松。我们知道，许多有文艺才华的人，往往政治条件都不好。我们希望组建一个水平上乘的文艺宣传队，所以我们说欢迎一切愿意革命，愿意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同学，包括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同学与我们共同战斗，共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它将是独立的，不隶属任何组织。我们为这支文艺宣传队起了一个名字“红鲁艺”——它的来源当然是延安的那个“鲁艺”。尽管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延安鲁艺出来的艺术家们已被打成黑帮、修正主义份子，但我们还是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在今天看来已是很正统很革命的名字，在当时与其他火辣辣的名字相比，多少还有一点浪漫情调和小小的政治忌讳。

整个策划完成后，我们便到武汉歌舞剧院及其他地方借了一些乐器，在湖北艺

术学院要了一间民乐排练厅，在市委办了革命群众组织的登记手续并领到了一笔经费……真是大革命了，一切按常规不可想象的事情，都可以办得到了。只是有的顺利一些，有的困难一些而已。十二月中旬，我们将几份花花绿绿的招生广告贴到司门口大桥，汉阳门轮渡码头，江汉路原《长江日报》社……那一年，武汉的冬天特别冷，雪化后又冻成冰，连浆糊也结了冰。我们只得将结了冰的浆糊先放在手心，用体温将它溶化后再抹到墙上。（实际已不是墙，而是一层又一层大字报结成的板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贴完一张，再去另一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在干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由自己决定的事。（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那时全国人民所干的事，其实都是由一个人或一种观念决定着。）那是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我们最自由、最热情、最快乐的日子。

贴完招生广告，我们又印制了宣传队员登记表，并作好其他相应准备。到了招生那天，我，何帆，还有几个原校文工团的同学早早来到湖北艺术学院那间民乐排练厅。那间排练厅大约有近百个平方，四周是花坛与冬青树，后面是一个小小的湖，湖边与花坛中有几副石桌凳。排练厅里还有一架钢琴，刚好可以用来考试……总之，一切都那样正规，如同外面没有那一场天翻地覆的震荡一样。湖北艺术学院也曾是我心中的殿堂，文革前，我曾多次怀着虔诚与崇敬的心情，到那里去听音乐会，毕业生演唱演奏会。我也曾做过报考湖艺作曲系的梦，但这个梦随着我考高中时，知道了父亲的经历后结束了。我知道那时的湖艺已在乡村社队或工矿企业招收了一些连简谱也不会识的学生。我没想到的是，随着这场疾风暴雨又扑朔迷离的运动到来，我能以一个主考官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走进这座华中地区音乐艺术的最高学府。可能到这时，我才真正接受并切近了这一场运动。

招生进行得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几天中有数百人来报名应考。我们计划组建一个比较正规的文艺宣传队，其中包括一个全建制的民乐队：四把二胡，一把板胡（可以兼），一支唢呐，一架笙，一支梆笛，一支曲笛，一架扬琴，一把阮，两把琵琶，一架手风琴；还有低胡及打击乐；一个声乐队（包括戏曲清唱）；一个表演队（舞蹈，曲艺，朗诵）；并提倡一专多能。

招生中，我发现，在这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中，在这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事业中，竟有这样多的精神流浪儿。这些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们历尽那么多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是太过于残酷的打击与折磨后，仍在苦苦寻找理解、温情，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自己的生存之路。有的同学考完之后，也不管录取没有，便留下来帮我们做事：登记，刻钢板，买饭，收拾屋子。有的自己没考上，又去找自己的姊妹同学来考。有的则一连几天都来，在一边静静地看。也有两三个一起来的，说要录取就一起录取……从他们填写的报名表来看，这些人大多是职员、教员、小商、独劳，以及资本家、旧官吏家庭出身的，几乎没一个正宗的“红五类”。后来的接触中，又慢慢了解到，他们中有我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儿子，有著名物理学家的女儿，也有个体豆腐坊业主的后代以及到那时为止依然关在监狱中的国民党军官的女儿。还有一个是已经下放到新疆，又偷偷跑回来的知识青年。

由于有各类乐器，特别是有了那架钢琴，使招生显得很正规。视唱，识谱，考察节奏、音准，在钢琴演奏下跳舞唱歌或演奏乐器，还有表演与朗诵……同学们自选的考试节目，也五花八门。从当时最时新的批判刘少奇的湖北慢板，到高尔基的

散文诗《海燕》，从舞蹈《大海航行靠舵手》，到民乐名曲《春江花月夜》……

招生结束，一支三十人的文艺宣传队成立。那时已是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了。天气越来越冷，排练厅外面的冰雪一直没有化，但刚刚相识的全体队员却以极大的热情与温情投入到排练中。几个任务不多的同学则分头准备演出用的服装、道具、化妆品，并到外面赶制了队员们的袖标与宣传队的旗帜。袖标上的字样是“红艺兵”，上面有一排小字：“毛泽东思想”。旗帜上的字样是“红鲁艺”，下面有一排小字：“武汉地区中等学校革命造反宣传队”。大多数队员是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戴上袖标，而且是这么一种新鲜别致的袖标。对于这样一些漂泊了许久，承受过无数心理折磨的少男少女来说，我想这是一个温馨难忘的时刻。

我们在湖北艺术学院一墙之隔的武昌实验小学要了两间教室，作为我们宣传队的男女宿舍。我们将课桌拼成几个大统铺，各人从自家抱来铺盖行李。这三十个少男少女从此就在一个更亲密的空间中生活了。和许多人的居家环境比，它很简陋很艰苦，常常连热水都没有，被子冷得象冰窟窿一样……但大家都愿意住在一起。几个月来的恐怖、高压、孤独、自卑、身不由主、言不由衷，在这里被一种家庭式的亲情与温暖代替了，被寻找到自己的价值，被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的兴奋与自信心理代替了。况且，那个时代的少男少女从来没有这么近地在一起生活过。

市委拨给的一点经费严格地用于公务。大家的伙食、交通、医药甚至一部份演出用品，都是自费的。但这些，在那种时刻，人们想也没有去想它。大家都尽心尽力地去做一切该做的事。排练厅安了一只北京烤火炉，便总是有几个人早早起来去撮煤劈柴生炉子。舞蹈队有一个叫“小妞”的女生，眉眼肤色都黑黑的，嘴角还有一颗痣，有点象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她总在大家还熟睡的时候就早早起来，练一会功，便去了排练厅。等我们去时，火炉已燃得旺旺的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一些同学会给那些还在排练的人去食堂将饭菜买回来，热在炉子上。当时，队员们各家的经济状况很不一样，有几个特别困难的，常常连几分钱的菜也不买，只吃从家里带来的一点咸菜，或两人共吃一份菜。排完节目的人，有的趴在钢板上一张一张地刻乐谱刻脚本。另外的人马上会去印刷、装钉……没日没夜的排练期间，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宣布放一天假，回去见见家里人，换洗换洗衣物，拿些日用品。可到了下午，许多人却陆陆续续回到了排练厅。如初恋的情人不愿有太久的分离。

就是在那个下午，在那个温暖的火炉旁，吃着有人从家里带来的零食，突然有一个女生讲起她的家庭，讲起她几个月来痛苦的经历，她后来哭起来，痛痛快快地哭着……接着，许多人也如她一样叙说起那些招生表上不曾写出的故事。此时此刻，并没有谁如“忆苦思甜”会那样强迫他们说这些，我想，大约他们需要把这些压迫他们很久的淤积倾倒出来，他们期望获得真正的理解、信任与同情。

“红鲁艺”的第一场演出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天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那个岁月，这是一个比其他任何日子都神圣的一天。演出地点在湖北艺术学院礼堂。这场演出是招待宣传队筹备组建过程中给了我们支持、帮助的各界革命战友革命同志的，也给队员们每个人发了十来张票，让他们邀请自己的家人、同学与亲朋好友来看。那天许多队员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来了。对于他们当中大多数

家庭来说，在那种非常时期，能坐在台下看自己的孩子表演节目，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艺术欣赏了。

那天的演出很成功。那时的人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什么演出，更不要说坐在这艺术院校的正规礼堂中看演出。各文艺单位早已斗得天翻地覆，电影院也没什么电影看。所以，当大幕一拉开，那气势恢宏的、经过改编作为序曲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一响，我就知道我和全体宣传队员们以及台下的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观众们被感动了。这种感动与其说来自这首歌曲中那些歌词的含义，倒不如说来自音乐本身的某种魅力。还有《在北京的金山上》那悠远柔美的旋律与舞姿，《我是一个兵》的激越与欢快，还有那个改了词的《老大爷扬鞭喜盈盈》，它本原是唱一位老大爷赶大车运送一群支边青年的，现在改为送一群红卫兵去见毛主席，但这也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一群曾经孤独的少男少女，大家这么近地坐在一辆“大车”上，无忧无虑地在蓝天下的大路上奔驰。还有歌舞《敬爱的毛主席》，那沙拜音，那手鼓，那维吾尔小帽和飞旋的衣裙及男演员大幅度的跳跃，以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又让人感到这是一群压抑了如此之久的少男少女的狂欢节……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我。

音乐艺术常常能说出各人所需要的东西。

演出还没有结束，就有人找到后台，一个是湖北艺术学院某组织的，邀请我们过几天与他们同台演出。一个是某工厂的，他们厂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希望我们去为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别的宣传队的，要来学习我们的节目……这一切都让我们兴奋。一群孤独的漂泊者走到一起来，使自己这个集体变成别人尊重别人需要的集体，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最高的享受。

第二天，许多人一反常态地抽空回家去了，他们希望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再一次分享那种欣慰与满足。在那风雨飘摇的时候，这是比任何礼物都珍贵的一种东西。

就这样，“红鲁艺”成立不到一周，就一场接一场地演下去了。有时一天两场，有时一天三场。有时邀请单位会派交通车或卡车来接我们。有时那些单位没有车来，我们便背着乐器、道具，举着我们的队旗，穿过长长的街区步行而去。直到那时，我们的宣传队还没有明显的派别倾向。从我们当时的演出的原始记录看，有保守派组织，有造反派组织，也有中间派组织，还有尚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部队及军事院校。晚场结束之后，每每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邀请单位留我们吃夜宵，而我们又坚持不吃。双方要上车下车拉扯半天。有时是吃完夜宵之后我们坚持要付钱，对方又坚持不收，你推我搡地又纠缠半天。

演出完后回到我们的寝室，是大家最快乐也最惆怅的时候。远离了喧嚣的世界，远离了火热的舞台，同学们常常会回到自己的心中。在这静夜湖边一隅，许多最本真的东西会翻涌上来。那个从新疆逃回的同学常在远处拉着一支凄婉的曲子。那支曲子叫《金珠玛米赞》，是藏民歌唱解放军的。但经他一拉，却让人听得心里酸酸的。有人躺在被子里，让“琵琶”（宣传队的一些人常被自己演奏的乐器命名）弹一支《彝族舞曲》——这是一些平日不能上台的曲子——听者和奏者便都沉浸在

这柔丽忧郁的旋律中，如醉如痴。有时乐队的几个人也会合奏一些曲子自娱，那也是一些平日不能上台的曲子。如“江南好”，“故乡的回忆”，“二泉映月”以及当时已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苏联的音乐……大家在音乐的默契与和谐中，在偷吃“禁果”的兴奋中，在一种无言的交流中被感动着。我常能看到听者与奏者的眼睛忽然湿了。

我朦朦胧胧地感到，一些队员进入了初恋的情绪。这许多冰冷的心因聚集在一起而温暖起来。

一月下旬，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到武汉。大大小小的单位纷纷奋起夺权。派别之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在那之前，我们宣传队尽管也有一些“造反造反，一反到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类的节目，但那毕竟是空泛的，不涉及本地区派别利益的。我知道，包括我在内的全体宣传队员们，都不会倾向于保守派。因为大家都是几个月来，甚至十几年来直接的、间接的、现实的或心理的受害者。但是对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我们也保持着距离。尽管这时，因为我们“红鲁艺”的实力与影响，已有一些较大的群众组织来串联过，希望我们集体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一点很像后来办公司挂靠某机构），但我们一直没有做这样的决定。

那时，由各级政权及军队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由于毛泽东主席及中央文革的态度，已处于收缩静观状态。他们虽然不再张扬，但实力依然很强。夺权斗争开始以后，使本已缓解的保守派与造反派间的冲突明明暗暗地加强了。造反派内部的冲突也加剧了。在我们的演出中，也愈来愈多地闻到这种火药味。常常会因为我们的某一句台词符合了某一派组织的观点，而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有时会仅仅为那一句台词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甚至要求我们再演一遍。我们已经到了必需选择的时候。这一点成了“红鲁艺”成立以后困扰我们的最大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晚，我们正在湖北省汽车配件厂演出（那是我们当天的第二场演出），有人宣布，说汉阳快活岭一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夺权遭围攻，有发动武斗的危险。我们当即便带上乐器道具与汽配厂的人一道乘大卡车去出事地点。这是我们“红鲁艺”第一次具有战地宣传队意味的行动。汉阳快活岭，离市区有几十公里路。发生冲突的双方大约都请求了增援，成百上千辆卡车、交通车、吉普车驰往那个方向，很快就把那条窄窄的郊区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天很黑，又下起了雨，谁也看不见谁，更看不见出事地点究竟在哪里。象一次战争中混乱的军事调集，数万人，也许是数十万人，被迫滞留在这暗夜的冷雨中。一些车辆企图调头回转，于是公路便堵得更结实。雨越来越大，夜越来越黑，我们的队员们用种种方法保护着自己的乐器。大家挤在一起，品尝着战乱中那更显可贵的温馨。过了子夜，前后依然没有松动的迹象，我们便下命令：除部份队员留下守护大型乐器和道具外，其余人弃车步行返回——那是“红鲁艺”的成员们至今也难以忘却的一夜。对于那些十多岁的孩子们来说，那是他们一生中走的最长的一段路，又在雨中，又在寒冷中，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乐队队员脱下衣服，包裹住乐器娇嫩的部份。身体强壮的男生与弱小的女生结伴。衣衫厚实的将衣服脱给衣衫单薄的……那是一次温暖又悲壮的远征。走了不远，大家的衣服鞋袜便里里外外湿透了。从夜里一两点钟走起，一直走到天亮，才陆续回到实验小学那两间宿舍。有人病倒了，有人还强撑着去熬姜汤，有人生起火炉，为大家烤衣服，实验小学的老师们还送来了热粥……

…这一次遭遇让大家吃了很大的苦头，也品尝到苦难中的友情。但这次行为本身，依然具有很强的游戏色彩，大家为什么一定要跑到那个荒僻遥远的地方去，并没有具体的利益驱动。

随着夺权运动的发展，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代表比较激进的造反派组织观点的文章——《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局势的声明》。围绕这篇后来非常著名的“二·八声明”，全武汉的市民分为水火不容的“毒草派”与“香花派”。当然，也有一小部份人说不是毒草，也不是香花，是大白菜，因而成为“大白菜派”。保守派几乎全是“毒草派”当然是无疑的了，一部份温和的造反派组织，如当时著名的“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及中学红联，工造总司，也是“毒草派”。这是权利再分配中很有意味的一次分化组合。以后还有好几次这样的分化组合。“三新”都是以某一所大学为基地，向社会扩张的群众组织。人数不算太多，但有较强的组织性与凝聚力。

“红鲁艺”的大多数成员也持毒草观点。这大约是“二·八声明”以较强硬的态度伤害了一些独立的、弱小的群众组织，使队员们又一次感受到运动初期红卫兵的某种作派。我们所在的湖北艺术学院最强大的组织是持“香花派”观点的二司，（全称为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相对原来老红卫兵那个司令部而称二司。）我们不得不面临与他们的冲突。在当时，这是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路卡。走到哪里，都会有人问你是“香花派”还是“毒草派”。为了这个今天看来极荒谬的问题，当时许多父子反目，夫妻离散，好友翻脸，甚至陌生人乘车坐船都会争吵起来。武汉的街头、广场，天天都有无数的人为了这个问题辩论到深更半夜。那时还不兴动手动脚，大家各讲各的道理，各显各的口才。这也成了许多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吃过饭，便匆匆跑到街上去，一处一处地听去，直到深更半夜，乐不思归。有一次，我见一位踩三轮的老头，将车停在一堆辩论的人群旁，一直听到结束，然后又赶去听另一堆。我想，这大约是武汉市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很有一点罗马广场或英国海德公园的味道。

“红鲁艺”的成员们演出归来后，许多人也出去旁听或参加辩论，然后又把各种观点、事实、反映带回来。我不希望分裂，只希望能在心平气和的讨论中达到统一。后来证明我是多虑了。“红鲁艺”的成员对于这个集体的珍爱胜于观点的分歧。经过几昼夜痛苦认真的分析、辩论甚至争吵，“红鲁艺”统一了“毒草派”的观点。我们不想为了生存，为了一个舒适的环境，牺牲掉自由选择我们思想的权力；同时，更不想牺牲掉这个我们都很珍爱的集体。这次小小的风波中，除了一个人因为强烈的“香花派”观点自己离去外，很快就过去了，并没有留下任何裂痕。因为不久之后的时局变化，已使这场毒草香花之争变得不很重要了。

就在这一段时间中，“新华工”司令部派了一个姓刘的大学生多次到我们宣传队来，动员我们集体加入“新华工”，直属司令部，为司令部第一宣传队，可以驻进新华工校园内，并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

我们要就依然保持“红鲁艺”的独立，但马上就会陷入与湖艺“二司”的冲突，从而失去“红鲁艺”这个生存之地。要么就加入“新华工”。我们已别无选择。又经过几昼夜的商议、争吵、辩论，“红鲁艺”全体成员终于通过了集体加入“新

华工”的决定——在这些复杂激烈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坚持演出。我知道，只有演出，才是我们最好的存在方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红鲁艺”告别了战斗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湖北艺术学院，全队迁到新华工，改称“新华工司令部第一宣传队”。原来的“红艺兵”袖标改换成组成火炬图样的“新华工”的袖标。在宣传队中，只有一部份人成为“新华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给了红卫兵袖标与红卫兵证。其余的人只有“新华工”袖标和“新华工”兵团证。我，何帆及很多骨干都只有兵团证。司令部还派来一个姓袁的大学生做领队，类似党代表一样。我知道，我们又落入某种相似的制度中。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知道了我的地位、作用、力量与价值。我不会离开，因为我喜欢这支宣传队，并依然能对它发生影响。

三月，局势急转直下。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武汉军区宣布了几乎所有的“香花派”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并逮捕了它们的主要负责人。已经沉寂衰落的各个保守派组织又组建成组织严密、供给充足的一个全市性组织——“百万雄师”。“三新”及其他温和造反派组织立刻也处于劣势。如同大革命失败了一样。那时宣传队每每演到歌舞《抬头望见北斗星》时，台上台下都会有人哭泣。三月中下旬，“新华工司令部”宣布我们这支宣传队解散，各自回校复课闹革命。对于“红鲁艺”的全体成员来说，“大革命”失不失败是一回事，离开这支寻到自己精神情感依托的宣传队，重新返回学校，重新成为漂泊者是更痛苦的事。解散那天，许多人哭了。大家互相在日记本上写下许许多多离别赠言。那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痛苦也最真诚的分别。那些离别赠言，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意味的。用今天时髦的语言来讲，是在用当时那种特殊的“话语”，叙说着自己内心的、纯属个人的真性情。当时已经有一些队员在默默相爱了，但那是一种极含蓄，甚至是极压抑的爱。但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武汉当时的那种形势，显然与毛泽东主席当时的思想及论述是对立的），“三新”等一批原先比较温和的造反派组织，利用自己尚且合法的地位，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武汉军区并张扬为“工人总部”等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翻案。被解散的一些群众组织又重新聚合起来，为恢复名誉作出各种努力，主要矛盾又转回到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了。斗争越来越激烈，武斗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宣传队解散之后，队员们并没有回校闹革命，（回过学校的人也知道，学校并未复课，也没有几个人在学校闹革命）而是互相间频繁地往来，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他家。在那肃刹的社会气氛中，躲进自己所珍爱的友谊圈子。许多人已经不能离开这个圈子了。

我和何帆都回到家里。有小道消息说，大学要开始招生了。于是我开始复习功课。几个来家玩的队员于是也拿了课本到家来复习功课。但我们只复习了几天，便终止了。一是我们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二是外面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如同《青春之歌》中所说的：“整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课桌了。”又有一些宣传队员来家，要求恢复演出，正式的理由是在这革命低潮时期我们要坚持战斗；潜在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在一起，过我们特有的那种温馨又激越的生活。只有恢复宣传队，我们在

一起才能合法化。我征求了许多队员的意见，没想到大家竟都要求恢复活动。四月，我们进驻“新湖大”（今中南财经大学）恢复活动。这时，我和许多队员已在这几个月的经历、感受与思考中，有了更明确的情绪、倾向与观点。我们的节目不再是一台热闹精美的歌舞，而是有了一些观点鲜明、形式激烈的节目了。如为“工总”翻案，打倒“武老谭”（指“武汉的谭震林”——陈再道），控诉武斗等等。我们经常走上街头，为绝食的、静坐的、游行的人们演出。我们的演出开始具有了硝烟气息，有时还充满危险。在无法进行正常演出的时候，我们还直接用大字报、大标语表明我们的观点。我当时已经有了大革命失败后继续斗争的革命志士的那种感觉：兴奋、豪迈、悲壮，甚至还有某种为正义崇高的目标献身的冲动。

随着武斗的升级，我们所在的湖北大学愈来愈多地成为进攻目标。校园里筑起了工事，一楼的窗户用砖块堵上，楼梯安了铁栅栏门，楼上准备了许多砖块石灰棍棒与食品。在这期间，我也亲眼看见过几次武斗的场面，第一次感到革命的酷烈。但我觉得，自己已经渐渐坚强起来，和几个月前，大串联中，登陆艇上那个多愁善感的少年相比，已经成熟多了。

在这场动荡又充满血腥气的状况下，我们努力坚持排练和演出。五月，“新华工司令部”来人，再次召我们返回，说司令部正在准备创作排练一部史诗性的、象《东方红》那样的大型革命歌舞，纪念文化大革命一周年，许多文艺团体的创作骨干也集中到了“新华工”。那时，“新华工”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装备的精良、工事的坚固及人数的优势，已成为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最后的一个根据地，被称为“解放区”。我当时曾创作过一个名叫《解放区的天》的歌舞表演节目，用《兄妹开荒》、《解放区的天》等几首延安时期的歌曲改编而成，表现武斗时期“新华工”造反派的乐观勇敢精神。每次演出，台上台下都一片激动。

“新华工司令部”成立了一个正规而且庞大的创作表演团体，武汉许多专业演员都集中在这里。当时，这里也是全国许多著名文艺团体来演出的一个小小的“革命圣地”，如三军文工团，胜利文工团……我在这里曾见到过许多著名的作家、作曲家、剧作家、歌唱家及其他表演艺术家。也在这里见到过周恩来、谢富治，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首脑谢胡。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因为“七·二〇”事件的爆发而中止。

七月十九日，我们宣传队接到通知：将有重大武斗发生，校园内，除敢死队员之外，其余人员立刻疏散到华工俞家山后去。

夏夜的酷热中，在山林与稻田的星星点点的萤火虫的光亮里，数万人悄无声息地朝郊外撤离。宣传队在这撤离中渐渐走散。

当夜并没有发生武斗。其后便是一系列极富戏剧性的变化。第二天，爆发了著名的“七·二〇事件”。几天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七·二〇”为反革命事件。全武汉的保守派组织一夜倾覆。“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翻案。各单位纷纷成立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权力再分配中再次爆发“钢”“新”之争。造反派组织以数月、数年的积怨追捕与报复保守派组织成员。又一批激

进造反派组织被改组后的军区取缔。又抓了一些人，还传出有一个叫“5·16”的全国性的阴谋集团的小道消息……

“红鲁艺”最后一次大的行动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九月初。当时，我已厌倦了这胜利后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各派火并，厌倦了中央一些扑朔迷离的口号与措施。“红鲁艺”的宣传队员们在近一年的血火洗礼中已不再如原来那样敏感、脆弱、孤立无援，而变得成熟、坚强、甚至世故、麻木。我们不再象以前那样演出后坚持不吃夜宵，或坚持要交钱，而常常会对那个单位的伙食如何品头论足了。因为这一群孩子们已经看到那些掌了权的人是如何挥霍的（当然，与今天许多人的挥霍相比，那时的人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纪律性、凝聚力已不如原来那么强，因为外界对大家的压迫已变得很小了。大家已获得了独立的生活能力与信心……这一切，都曾让我感到隐隐的失落与怅惘。

九月一日，我们应邀请去西安铁路局演出。经过两天艰难的行驶，到达西安时，发现这座古城正陷入血与火的内战之中。这里庞大军工企业的现代化武器，让我们看到了比武汉更酷烈的战斗。一堆又一堆在夏末的气温中变成了紫茄子般的尸体，有的还被割去了舌头，剜掉了眼睛，截掉了四肢……到处都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尸臭……为了避免武斗的伤害，我们被安排住在远离市区的铁路线上的一节孤零零的软卧车厢中。那是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第一次坐软卧，但不是在行进中，而是在一个荒僻冷清的停车场上。四周没有人，也没有灯光，只有许许多多的蝗虫在铁路边的荒草丛中蹦跳，黄昏时，可以看到三五个铁路工人在草丛中逮蝗虫，他们有时当场就把它一撕，吃掉它们肚子里的“虫黄”……尽管兵荒马乱，我和几个同学还是去了大雁塔、小雁塔，爬上了残破的古城墙。那时，这些千古名胜，见不到一个游人。

几天后，我们只得继续西进，到达青海省首府西宁。在这苍凉旷远而极宁静的的大西北高原上，我们“红鲁艺”作了它最后的几场演出，然后又返回西安。

“红鲁艺”最后的解散是富于戏剧性的。在西安，依然住那节软卧。我、何帆及另外的三个同伴，准备南下沿宝成线去成都、重庆。我那时突然渴望过一种自由漂泊的生活。其余的人有的返回武汉，有的将去别的地方。车厢里静静的，弥漫着一种怅惘与抑郁的气氛，似乎大家都知道：这是“红鲁艺”最后的日子了。车厢蓄电池的电渐渐弱了，灯越来越暗，只剩下一丝红红的星光。女生们依偎着，但她们不再流泪。男生们沉默着，也不再叹气。十个月来，我们几乎经历了一生。有人在弹琵琶，那清丽哀怨之声，又让人想起了“红鲁艺”最初那些令人心颤的日子。那种单纯，迷醉，忘情又投入的日子，往后不会再有了。但也不会再忘记。

夜深了，没有人睡觉。车厢的灯终于完全熄灭了。这一群在风雨飘摇中走到一起来，又在风雨飘摇中分手的少男少女，各自在品尝着甜蜜、痛苦、惆怅、欢乐、紧张与梦想。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我们一行开始了西南之旅……

那以后，“红鲁艺”还有过几次临时性的聚集演出，但作为文革中一个完整又

特殊的单位，从此不存在了。

在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竟鬼使神差地来了两个“红鲁艺”的女生。我们十多年没见了。她们现在一个做了经理，一个在武汉大学教经济。我们一开口，话题便是我们当年的“红鲁艺”。她们说，真是难以忘怀。

告别时，我们决定近期举行一次聚会，邀请所有能寻到的原“红鲁艺”的成员参加。到那时，或许又可以写一篇续集了。

□ 原载《华夏知青》

∞ ∞ ∞ ∞ ∞ ∞ ∞ ∞ ∞ ∞

给毛主席献花女孩的文革厄运

• 吕大渝 •

〔吕大渝，原中央电视台早期播音员，在她还是少先队员的时候就曾给毛主席献花。1960年，16岁的她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文革中她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名是“炮打中央文革”。现在她移居美国。在《走近往事》一书中回忆了她前半生的经历，本文摘录部份内容。——编者〕

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

“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些，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的麻烦。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然不会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战斗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过大江”收拾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

我一气之下，抄起一枝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进入会场，我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

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到了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因此惹来杀身大祸。

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 she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电视台的“牛棚”。

当我还是个少年人时，我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撒满了鲜花和阳光，但是，十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眼前的生活与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去甚远，我仿佛永远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

我十岁那年拍摄了《祖国的花朵》，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未止息。

小时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长大，等待长大后去实现从事电影事业的美好理想。长大了，我刚刚爱上了电视事业，却碰上了“文革”，又坠入了等待之中，等待着对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后处置。

我明白，当时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那四个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们的阴影下，我此生将没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运已然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将是何种发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 ∞ ∞ ∞ ∞ ∞ ∞ ∞ ∞ ∞

“牛长”
• 方 成 •

〔方成，漫画家，文革开始时在《人民日报》任职。——编者〕

相面的给我看过相，说我不能独当一面，做不了领导人，我已离职休养多年，从档案上看，确实没担任过领导职务。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文革”初期，我在“牛棚”里当过“牛长”，也算是领导了，连副部长级的胡绩伟和陈俊同志都是我的部下，我领导着他们。

这例外，是另一次例外引来的。那时被当罪大恶极而押进“牛棚”受刑的，都是任领导职务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我却不是。我是被一张白纸条送进去的。

那天，报社“造反派”从社外揪来胡乔木同志，开大会批斗。我和“革命群众”坐在一起。在气势昂扬的口号声中，一张白纸条从会场后座传到主席台。主持人拿起大声宣读，大意是：方成在1957年没划“右派”，全是胡乔木保下的。众人听了，暴发起怒吼声，立即把我推上台去陪斗，让我做“喷气式”立在一旁。会后就被“勒令”劳动去。我曾和副总编王揖同志一起，被押到幼儿园当杂工，扫地、升炉子，什么都干。也曾和副总编辑李庄同志一起“推大纸”——把从纸厂运来成吨重的纸卷卸下车，推进纸库。各“战斗队”多次闯进我家里“抄家”。先来的几次只是用封条将书橱封上，什么也没动。来的全是工厂和行政部门的职工，平时常和他们在一起打乒乓球，说说笑笑的。只一次例外——翻箱倒柜、大动干戈，把书信笔记本抄走，当批斗材料。他们是编辑部的一个“战斗队”。

进了“牛棚”除了向着伟大领袖像“早请示”、“晚汇报”、听训话和“学习”之外，就是体力劳动。监管“牛棚”的“革命小将”，也是平时常在一起打球、说笑的，使我的心情稍安，实际上也暗中受惠，挨“批斗”少，也不重，正式“揪斗”也不多，因为拿得出的“罪证”只是我在1957年写的杂文《过堂》——现收入《中国杂文大观》第3集，此外没什么可无限上纲、震人心魄的了。所以只判为“漏网右派”和“反革命文人”——我只写过那一篇算是“文”的《过堂》，其他全属例外。

我被任命当众“牛”之长，领着这几十位“牛鬼蛇神”天天下地劳动。我刚过50大寿，体质强健，体力劳动我不怕。批斗无非是硬上纲的一套，触不动灵魂，心里明白，应付也无所苦。苦的是“学习”时闲下来，想那在另一“牛棚”里的老伴陈今言和家里无人照料两个孩子，一个上初小，一个刚6岁，生怕他们饿死。那时谁敢去看顾“牛鬼蛇神”的家属啊。我只好写检查来排遣，苦度时光。在“学习”时，默默地在四卷宝书上做索引记号。因为劳动量很大，疲劳之身躺下就睡着。饭量也大，一顿早餐吃三个大窝头和一大碗粥。别人写检查，一一通过，不久就陆续被释，出“牛棚”，进“干校”。造反派说：看了我的检查很生气。“牛棚”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也只好放出来。到1970年，“造反派”遵照林彪的指示，把“牛鬼蛇神”横扫出北京城，户口也必须迁走。但在执行中，不得不迁户口的唯有负严重历史问题的两户。只一户例外，是我们一家，那是我当众举手报名要

迁的。我不想在北京这么呆下去了，于是随干校迁到河南叶县刘店村。

我借农民的一间房住下。和农民为邻，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像来了亲戚那样欢迎我们。房主还是生产队的书记，对孩子特别爱惜。别家也一样。常把我孩子接去玩，煮好红薯给他们吃。他们十分穷困，红薯是他们能拿得出的最好的礼物了。孩子还交了好些小朋友，我们住下来一百个放心。在干校我被安排到厨房帮厨，那是最轻松的活儿了。整天干活，心情比在北京好多了。平时下班回家唱着进门的陈今言，已变得进门一言不发，闷得无奈只能唱唱“样板戏”过那沉闷的时日。半夜里她常猛然惊醒，说是以为翻箱倒柜抄家的又来了。那次恼人的情景在她心里结了个大疙瘩，怎么也解不开。1972年我家户口迁回北京。她变得郁闷不堪，日夜干活，不开口讲话，到1977年终于倒下，刚满53岁！她原是排球、篮球和乒乓球运动员，又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是爱说爱笑爱唱，体质比我强的人。我们共同生活25年，没红过脸，一次也没有。直到如今，我还在梦里常见到她。

□ 摘自《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 ∞ ∞ ∞ ∞ ∞ ∞ ∞ ∞ ∞ ∞

一份揪心的表决心书

• 金雨雨 •

为了要搬家，把多少年来从未整理的书柜彻底整理了一下，整理出一本文革时的笔记本。正想把它往废纸中丢时，不经意地随手翻了一翻，原来是当时一些听报告的纪录，新发表的最高指示之类，其中还有一篇是自己写的思想汇报与表决心的底稿。这是在一次大抄家后革命红卫兵要我写的。这一段历史，在脑子里早已尘封起来了，轻易不愿意去回忆。好奇心使我读了一下这篇30多年前的检查，不读则已，读后使我内心的震动无以名状。现在把这篇并不长的检查抄在下面：“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

文化大革命，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将一切社会渣滓，像扫垃圾一样被英勇的红卫兵彻底扫掉。

感谢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的新气象带到了我的家庭。自从把黑帮分子×××揪出来，把地主分子母亲押送还乡后，我发现两个较大的孩子如释重负。特别是最大的儿子，完全变了样子：过去他不爱劳动，有时还顶撞外婆。我总以为是孩子淘气，回家时总是不问青红皂白斥责孩子。外婆走后，儿子主动担任烧饭、管炉子等工作；并管理家里的钱，计算着每天的花费。老二女儿主动担任买菜、家里的清洁卫生。

由于红卫兵对孩子的教育，使孩子们认识到自己的爸爸对劳动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因此他们根本不愿意再喊“爸爸”，并且不让我替爸爸洗衣服。

孩子们的进步，也教育了我这被脉脉温情蒙蔽着、老划不清界限的母亲。我觉得自己最大的错误是：第一，不该让我地主分子母亲来给我带孩子；第二，不该沉沦在资产阶级教育家庭里不能自拔。现在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去掉了压在我头上

的两个大包袱。

我坚决要求：

(1)我家里的财产，不管将来作何处理，我与孩子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其他一律坚决、坚决、坚决不要。

(2)孩子由我自己负担，在×××没有改造好以前，孩子不要他负担，只要给他最低生活费用就行了。

就我记忆，在查封的房子里，除了家具外，还有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应该交还给劳动人民。它们是：“照相机一个，望远镜一个，小闹钟一个，画册一本，塑料罐一个，×××呢大衣一件，西装两套。”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很抱歉找不到原话了）：豺、狼、虎、豹等动物吃人，吃了就是了；人为万物之灵，比动物要先进多了；在吃人以前，还要给你说一番为什么要吃你的大道理，使得你被吃时还要对他们感恩戴德。

我的孩子都是我母亲亲手带大的，他们与外婆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有着渊博的知识、会给儿女讲各种故事的父亲，孩子们从来以有这样的爸爸而自豪。而当时因爸爸被揪，外婆被赶，家里被抄，生活已经很困难，孩子们冬天都穿不上棉鞋。孩子们为了安慰我，默默地计划着用钱，主动干家务事；我这个身为“黑帮家属”的知识分子，却能写出这样感恩戴德表白书来。试问：一个好好的家庭，顷刻间支离破碎，我与孩子们能“如释重负”？

□ 原载《南方周末》2001年4月5日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